

松崎慊堂與《縮刻唐石經》芻議

劉玉才

松崎慊堂(1771—1844),名復,字明復,號慊堂。日本肥後國(今熊本縣)益城郡人,江戶時代後期著名考證派儒學者。幼年遵父命剃髮爲僧,年十五始至江戶,後入讀昌平學覺,師從大學頭林述齋(1768—1841)修習儒學,與佐藤一齋(1772—1859)有同窗之誼,林門高足。享和二年(1802),被掛川藩(封地在今靜岡縣掛川市)主辟爲藩教授,食俸廿人口,且頗受歷代藩主的知遇和倚重,出仕長達二十年。文化八年(1811),松崎慊堂還隨同林述齋前往津島接待朝鮮聘使,禮數周備,應對得體,衆人敬服,事後撰有《接鮮紀事》《接鮮瘡語》。致仕之後,松崎慊堂於江戶城西羽沢村筑石經山房,與狩谷棧齋(1775—1835)、市野迷庵(1765—1826)、山梨稻川(1771—1826)諸同道遊,潛心漢唐經注之學,校勘經籍,教授學生,前後主持刊刻《海錄碎事》《陶淵明文集》《三謝詩》、影宋本《爾雅》、《縮刻唐石經》等書,而尤以《縮刻唐石經》居功至偉,最爲後人推重。弘化元年(1844)四月,松崎慊堂帶著事業未竟的遺憾辭世,享年七十四歲。其詩文著作後人輯爲《慊堂全集》,收入《崇文叢書》;另有漢文稿本《慊堂日曆》存世,記錄其五十三歲至七十四歲間行事,通行有山田琢譯注本。

—

日本江戶時代中期以降,雖然朱子學仍居於官定正學地位,但在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徠(1666—1728)倡導的古學影響之下,經學考據學風漸起。徂徠門下的太宰春台(1680—1747)、山井崑崙(1680—1728)、根本遜志(1699—1764)均有此傾向。^①學出徂徠的片山兼山(1730—1782)、井上金峨

^① 太宰春台撰有《古文孝經孔安國傳校正音注》《論語古訓》,爲學之縝密超越乃師。山井崑崙著《七經孟子考文》,根本遜志校勘《論語皇侃義疏》,頗爲清儒推重,影響清代學術甚巨。

(1732—1784)，雖張折衷派之幟，批評徂徠之學，但仍具古學旨趣。井上金峨門下的吉田篁墩(1745—1798)即以崇尚考証、校勘、書志之學而聞名。此後，隨著清代考據學者成果影響的深入，日本學界亦形成考證學派。學承折衷派的大田錦城(1765—1825)成爲考證學派奠基者，門下則有海保漁村(1798—1866)、島田篁村(1838—1898)相繼而起。松崎慊堂即“預流”此學術風尚，在江戶後期，與狩谷棧齋、市野迷庵、安井息軒(1799—1876)諸儒又開闢出漢唐經注校勘之學。

松崎慊堂在昌平學鬻師從林述齋，乃至出仕掛川藩教授，當以朱子之學爲宗，但在致仕之後，即旗幟鮮明地轉向復古之學。其墓表有云：“先生於學該覽博通，而尤邃於經義。年五十，更有所發明，敦攻漢學。嘗曰：經訓簡易，炳若日星，箋注茅塞，大道乃荒，欲復諸古，但在諷經與識字耳。苟不然，望文生意，師心自斷，私意日長，而經旨益乖，得無非班志所謂碎義巧說，破壞形體，終以自蔽者乎哉。”^①松崎慊堂學術的轉向，頗得益於與狩谷棧齋、市野迷庵、山梨稻川諸儒的交遊。他“最與狩谷棧齋相推重，自言吾志於復古，得之棧齋爲多”。^②狩谷棧齋師承考證學先驅吉田篁墩，在《說文》學、文獻校勘和金石考證領域頗有著述，且富收藏。松崎慊堂撰狩谷棧齋墓銘，述棧齋之學云：

翁少時志於律令學，謂不涉唐代諸籍，不能窮其根據，乃採《六典》《唐律》《太平御覽》《通典》等諸書精研之，遂上溯漢代，又進而修六經，恍然有所發明。其終身崇奉漢學，蓋基於此。翁曾與迷庵談經義，迷庵曰：“何所主？”翁曰：“主漢唐注疏。”迷庵曰：“非也。宜從事於宋儒經解，否則不適用於實用。”翁退執宋儒傳注，銳志鑽穴者凡二十餘月，謂兩漢經學最重師法，授受相傳，確有淵源；六代迄唐，雖漸失龐雜，古法尚不至蕩然；至宋儒倨然師心蔑古，究非洙泗之正派也。即往質諸迷庵，縱橫辯駁，徵據明晰，於是迷庵幡然心折，遂一掃宿習，亦從漢學。^③

此後，市野迷庵“獨解經專宗漢儒，以爲七十子親受孔子，更相傳授，至兩漢始爲傳注，則毛鄭賈馬之學，雖間有出入，亦皆洙泗源流也”，^④并著有《正平本論語劄記》《大永本論語劄記》《覆刻正平板論語及劄記》等書。由市野迷庵學術取向的

① [日]海野豫：《掛川故教授慊堂松崎先生墓表》，《慊堂全集》卷一，《崇文叢書》本。

② [日]鹽谷世弘：《慊堂松崎先生行述》，《慊堂全集》卷一。

③ [日]松崎慊堂：《棧齋狩谷先生墓碣銘》，《慊堂全集》卷九。

④ [日]松崎慊堂：《迷庵市野先生墓銘》，《慊堂全集》卷十。

變化，或可看出松崎慊堂學術理路的淵源。

松崎慊堂還撰有山梨稻川墓銘，亦可見其學術旨趣。銘文云山梨稻川“聞本居宣長之徒論皇國古音，恍然有誤，於是鑽究《廣韻》，以溯漢秦三代，曰三代之音正音也”，“音韻正而古書始可讀也”，“六經百家語出於秦以前者，皆古文也。唐宋以下，不目睹古文，故其說多妄。《說文》說古文者”，“今之學者粗識唐宋俗字耳，其果得讀六經百家語哉”，并撰有《古聲譜》《考聲微》《諧聲圖》《說文緯》等論著。^①山梨稻川僻處窮鄉，漢籍匱乏，然而深造自得，其音韻、說文學方面的許多見解，頗與清朝大家江聲、戴震、錢大昕、段玉裁之說暗合，令松崎慊堂深為敬服。山梨稻川晚歲抱其論著東下，擬與江戶名儒碩學論而定之，然居數月即染病賁志以終，松崎慊堂對此痛惜不已。

根據前述墓銘的高度評價文字，以及《慊堂日曆》的頻繁交遊記述，可以看出狩谷掖齋、市野迷庵、山梨稻川對於松崎慊堂學術崇尚的影響。松崎慊堂雖然在說文、音韻學等領域的造詣無法與狩谷掖齋、山梨稻川相比，但無疑是心嚮往之。狩谷掖齋著有《本朝度量權衡考》，松崎慊堂也撰《尺準考》，考證中國度量衡的起源。《慊堂日曆》記載的讀書摘錄和該博的知識領域，亦顯示出作為考證學者廣徵博引的治學態度。因此，有研究者認為松崎慊堂的學問或得益於狩谷掖齋等考證家學問的刺激而成。^②

二

在考證學派的影響下，日本江戶後期頗重漢籍版本校勘之學，不惟藏書風氣甚盛，且多有精校翻刊本行世。狩谷掖齋即“富于藏書，而唐鈔、宋槧、元刻，晉唐之碑刻法帖，所極難得者，亦多兼儲。每言吾非誇酉洞之富，欲化誤本為善本耳”。^③昌平學覺及諸藩刊刻的官版、藩版漢籍數量也大為增加。榭山精一《官版書籍解題略》著錄寬政十一年(1799)至慶應三年(1867)官版書即近二百部，凡例云據宋元槧本及諸家精校善本刊刻。松崎慊堂作為“預流”學者，亦致力於漢籍的校勘刊刻。《慊堂全集》收有《書楓山文庫古鈔本後》《書足利學所藏古經目後》等文，松崎慊堂對各處藏書均如數家珍，在在可見其深厚的漢籍版本學造詣。

① [日]松崎慊堂：《稻川先生山梨君墓銘》，《慊堂全集》卷十。

② [日]吉田篤志：《江戶後期の考證學——松崎慊堂の場合》，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大倉山論集》第二十三輯，1988年。

③ [日]松崎慊堂：《掖齋狩谷先生墓碣銘》，《慊堂全集》卷九。

天保十三年(1842)六月,江戸幕府令諸藩十萬石以上者各刻典籍,松崎慊堂“躍然曰:是盛舉也。張而大之,在吾儕矣。因注古典善本僅存皇朝當急鏤者,題曰《擬刻書目》,獻諸當路”。^①此書簡後題為《慊堂先生遺墨》,并附門生安井息軒跋語,見載於《日本儒林叢書》。跋語云:“具錄經史古本亡於彼而存於我者十餘種,次第而分疏之,進檀宇林公及諸名公好古者,^②慊以成其美。”今據安井小太郎氏梳理,將所涉書目逐錄於下,以見松崎慊堂有關漢籍版本之學識。^③

- 周易正義十四卷(應永間鈔本)
- 尚書正義二十卷(北宋槧本、金澤文庫舊藏)
- 禮記正義七十卷(北宋槧本)
- 宋建安刻本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南宋本)
- 宋建安刻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宋槧本)
- 春秋左氏正義三十六卷(單疏本、金澤文庫本)
- 史記(慶元年建安黃氏刻本)
- 漢書(慶元年建安黃氏刻本)
- 後漢書
- 文選六家注(宋崇寧六年所刻蜀大字本,嘉靖時汝南袁聚摹刻)
- 文選李善注(宋紹熙中尤延之刊本,嘉慶年鄱陽胡克家覆刊)
- 杜氏通典(楓山御本、宋板本)
- 大唐開元禮
- 舊唐書(京都東福寺龍眠庵藏古鈔本)
- 元板資治通鑑胡三省音注
- 畢沅宋元通鑑

次年,肥後國主召見,松崎慊堂又建言可請借足利學校藏宋槧五經注疏梓行。今存肥後藩版《影宋本尚書正義》,即據松崎慊堂影鈔本鈔刊。令人遺憾的是,兩項建議未及完全落實,松崎慊堂即罹病故去。此外,有學者認為,林述齋刊刻《佚存叢書》,松崎慊堂亦有重要貢獻。^④

① [日]鹽谷世弘:《慊堂松崎先生行述》,《慊堂全集》卷一。

② 林檀宇(1793—1847)為林述齋之子,時任大學頭。

③ [日]安井小太郎:《慊堂の漢籍翻刻に関する意見》,《斯文》第一編第二號。

④ [日]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學史》,第271頁,東京富山房1939年版。

松崎慊堂直接參與的漢籍翻刻，於《縮刻唐石經》之外，尚有縮刻明萬曆本《海錄碎事》《陶淵明文集》（附《三謝詩》）及影宋本《爾雅》。其中，《爾雅》卷首題羽澤石經山房刻梓，以狩谷榊齋影鈔宋本為底本，校以十餘種版本，卷後附有《校譌》。松崎慊堂有跋語云：

此本係北宋仁宗時刻版，南宋高宗時補刊。原本京師大醫某君所藏，亡友狩谷卿雲借鈔極精。余病有宋以來此經滅裂，欲訂一本以貽後學，顧世無善本，忽睹是本，急請卿雲獲之。入刻有年，所未敢出以問世者，猶恐其有訛脫也。後又得室町氏時翻刻大字本，蓋所謂蜀本也。詳攷其體貌，蓋與是本後先所刻，亦有南宋孝宗時補刊，其字豐肥，雖異是本之謹肅，至其源流實同。故據以訂正，參以元明諸本，其訂正異同處，旁施黑點，仍作校譌附末簡，庶存是本之舊，使讀者兼知二本之同異也。（小字略）

松崎慊堂對於自己參與翻刻儒經的成績尤為自得。《慊堂日錄》天保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條，在歷數日本各代傳抄翻刻儒經的成果之後，記述自己先後參與市野迷庵覆刻堺版《論語》、狩谷榊齋覆刻明道版《御注孝經》的校勘，又建言白川城主安部君翻刻岳珂本《周禮》，浜松相公翻刻宋余仁仲本《公羊傳》《穀梁傳》，佐野參政公翻刻趙注《孟子》，加之自己翻刻的影宋本《爾雅》，十三經中已有七部，深以為榮。當然，松崎慊堂用力最深且為其帶來最大榮譽的還是《縮刻唐石經》。

三

松崎慊堂以唐開成石經為現行刊本之祖，而宋元諸儒竄亂經典，通行《十三經注疏》本難副人意，遂謀劃刊刻石經，復其舊本，以饗學人。其《鈎摹石本九經字樣跋》云：“予嘗病近世學者徒務浮說碎義而不熟於經文，謂雖學倍其方，亦無經本之所致，因欲刻單經善本以貽後學，乃取唐開成石經，撰善書人縮臨之。”^①《慊堂松崎先生行述》亦云：“欲令學者專玩經文，存其大體。三年一藝，多聞闕疑，庶乎日用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可以幾也。若夫訓詁原諸《說文》，參諸漢注唐疏，餘力以及三史、《文選》。如是而材之不成者，未之有也。迺把開成石

^① [日]松崎慊堂：《鈎摹石本九經字樣跋》，《慊堂全集》卷十二。

經益以《孟子》《大戴禮記》，考訂以授梓。”^①

《縮刻唐石經》計劃的實施起於天保五年(1834)，松崎慊堂時年六十四歲，《慊堂日曆》天保五年二月十三日條，已記石經碑本六十函，縮寫刻本六十二万字，一板十行二十字，并計算出大致刻寫費用。二月十九日條，囑門生作縮臨石經樣式，八行十九字，板框長七寸，幅寬五寸五分，完全遵照足利本《尚書》板式。同年八月，石本臨寫已經完成，并制訂出縮刻的詳細預算。松崎慊堂有《上八城相公書》，闡明《縮刻唐石經》的動機和目的，以求得理解支持，略云：

復持此志殆四十年，其初苦飢寒，中復苦仕途，致仕後又沉淪於醉鄉，皆不得成，且爾時經學破壞，無善本可讀矣。五年以來，取唐開成石本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手親校訂，遴選良手，縮臨字畫，一依石經之舊，猶有疑誤，用《文字》《字樣》參定。傍作之音訓，音訓一做宋呂祖謙《周易》之例。夫夫子晚定六藝，修經一也；蔡邕立石鴻都門，修經二也；魏邠鄂淳輩正始中立石大學，修經三也；唐開成中宰相鄭覃立言訂定，刻石於國子監，修經四也。今既一千年，而復何人，悍然敢任於夫子修經之後勁也？夫子之修經，聖述也，固非後學所比擬。漢蔡邕、魏邠鄂淳、唐鄭覃皆革當時之弊，漢石殘而魏石立，魏石殘而唐石立，唐石之立，經亦修明。宋元諸儒任意竄亂，不可卒讀。吾之復唐石舊本而已，非僭妄也，要供吾讀本也。^②

《慊堂日曆》自天保五年之後，有關《縮刻唐石經》的記錄不絕于書，據此可以梳理其實際的操作過程。大致而言，歷經臨寫石本、裝潢成冊、校定經文、刻寫上板、核對清樣、印製成書諸環節，其間夾雜松崎慊堂與同道、門生的磋商，籌集刻資，以及與裝潢、刻板工匠的往還等內容。由於部帙龐大，臨寫石本工作主要委托門生和寫經生，文本校勘則是松崎慊堂親自主持，後世頗有影響的門生安井息軒、鹽谷宕陰、小島成齋、海野石窓等人予以協助。松崎慊堂不僅制訂周詳的計劃，還起草了校勘規例，選定了校勘用定本和石經補闕所採本。此依據其校勘例、補例、成書凡例以及參校、補闕用本，^③略事核對，羅列於後，以見《縮刻唐石

① [日]鹽谷世弘：《慊堂松崎先生行述》，《慊堂全集》卷一。

② [日]松崎慊堂：《上八城相公書》，《慊堂遺文》卷一。

③ 原始文獻見載《慊堂日曆》天保五年八月、九月諸條，《縮刻唐石經·周易》卷首《例言》，以及濱野知三郎氏藏松崎慊堂手稿《刻經記》（據高橋美章《松崎慊堂の開成石經縮刻に就きて》轉引，《支那學》，第二卷第一號，1921年9月）。

《經》校勘之理

校勘規例

○開成石經之刻，先於唐長興三年始入木時恰一百年多，長興本取以爲本文，編入毛、鄭、何、王、杜、范諸注，當時謂之編注石經。而有宋一代以長興本爲甲令，收民間寫本不用，則兩宋元明所刻，悉皆石經子孫。故今校刊以此爲基，其殘闕剥落處，則據宋本最古且確者補入，施點右旁以別之。

○石經雖最古可貴，時有訛謬，加之磨改頗多，或立石時所改，或出後人所爲。北宋時唐世寫本佳者猶存，學者私據校改以入刻，故其善時有出於石經上者，而日本所傳古鈔經傳更爲隋唐佳本。故今以所據宋本及博士家所傳古本一一精對，考之以注疏，證之以《釋文》。石經誤脫無疑者，從諸善本而改補之；疑不能決及後儒考證確不可易而無別本可據正者，姑從原本，並發圈左旁，仍收其字與說於卷末；其磨改者以改爲正，則不點。

○各經行間有旁添之字，《左傳》一書最多，率賤儒據俗本所補，今例從刪落，然或有與諸善本合者，則從而采入之，依前例左點，收於卷末。

○唐諱缺筆者，依字填之，涉諱用或體者，則一依原文。正訛字、古今字正之不可勝正，包括石經用字之例，皆依原文，並不點發標異。

○原刻末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則全部字體當據二書訂正，而此刻不盡然者，隸變或字，古人所以不廢經典，相承已久，不必取此以捨彼也。今二書仍附帙後，讀者遇字體可疑，就而檢閱之，是非自判。但二書剥落處，馬氏刻本妄意補入，不足以校。今無本可據補，故一依唐碑，他日或得宋元佳搨，當補刻爲完璧。

校勘用定本

通志堂收儀禮正文注疏本，易、書、禮記（紹熙本），詩、左傳（附釋音刻足利），周禮（同），書（宮崎），公（元板），穀（宋板），爾雅（宋板），孝經（石臺），孟子（古鈔，活字，岐字小字本佳），論

石經補闕所採本

周禮（岳珂本），儀禮（陳鳳梧），禮記（古板），左傳（古板），公羊（求古元本），穀梁（金澤本），書、詩（古板），易（宋板），孝經（宋板），論語（界板），孟子（古本），文字、字樣（仍舊），爾雅（宋本）

《縮刻唐石經》以恢復原本文字而不是保存舊本面貌爲目的，故文本校勘廣

採宋元槧本及日本古本，力求成爲可資信賴的定本。成書文字改訂及異文並存之處，均施圈點予以標記，同時撰述考異文字，名曰《校譌》，辨析石經原文磨改及字形字體，羅列宋元槧本及日本古本異文，引述清儒考證成果，兼下取捨按斷。試舉數例：

《周易校譌》卷九“遘遇也”條：諸本“遘”作“姤”，陳鱣云咸淳本《本義》及岳本皆作“遘”。考《說文》無“姤”字，《釋詁》云“遘，遇也”。《易》“姤”，《釋文》云：薛云古文作“遘”，鄭同。馮椅《易輯》云：古文卦猶是古文，鄭本同。蓋雜卦以無王注，故未及改，流俗相承盡改爲“姤”，非也。凡石經不誤而他本誤者，此校例不標出，此標者惡其似是而非也。

《尚書校譌》卷五“大命胡不摯”條：“胡”字石經旁增。王鳴盛云：《史記》作“大命胡不至”，翫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孔本亦有“胡”字。石經“胡”字，初時誤脫，後考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以又脫也。案王說是也。阮元則據《說文》所引妄謂“胡”字不應有，石經旁添乃後人依《史記》增入者，殊謬。

《尚書校譌》卷九“其往”條：“其”上古本有“慎”字。段玉裁云：《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較今本多一“慎”字，疑妄增，足利古本蓋本諸此。案，古本是也，若無“慎”字，不詞甚矣，况有“慎”字，與《後漢書》李注合。段、阮之徒，媚皇朝古本，每加抑黜，至其善者，亦欲強掩之，非篤論也。上文“比佗”，此經“慎”字，是古本之尤確然不可易者矣。

《毛詩校譌》卷二“賈用不售”條：石經“售”字磨改。錢大昕云蓋本作“讎”。段玉裁云“讎”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讎”。阮元云《釋文》“售，市救反”。石經磨改所從也。

《縮刻唐石經》的《校譌》部份，天保十五年（弘化元年，1844）刊本僅附《易書詩校譌》與《春秋三傳校譌》，其餘諸經完成情況不詳，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學史》引錄《論語校譌》數條，然未明出處。關於《唐石經》校勘，清儒嚴可均有《唐石經校文》十卷，然松崎慊堂參校日藏古本，仍有其獨特的價值，對此筆者擬另撰文，此處不贅。

《縮刻唐石經》的刊刻出版得力於諸侯的支持，其中《三禮》爲掛川太田侯助刊，《孝經》《論語》《爾雅》爲肥後細川侯助刊，《易》《書》《詩》爲西條松平侯助刊，

《三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為佐倉堀川侯助刊。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紅葉山文庫本《縮刻唐石經》包括《十二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易書詩校譌》《春秋三傳校譌》，共計四十一冊，鈐有“秘閣圖書之章”“日本政府圖書”印，當是天保十五年初刊本。其中《周易》扉頁題《縮刻唐開成石經並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益城松崎明復審定，卷首有益城松崎明復題識《縮刻唐石經例言》。此外，《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書卷端鈐“益城松崎明復審定”印，卷末鈐“佐倉成德書院初梓”印。高橋美章文根據《慊堂日曆》記述，推測《縮刻唐石經》完成於天保十二年，而刊本跋語記於天保十五年夏月，實際此年四月松崎慊堂即病逝，應還沒有見到全書的出版。松崎慊堂臨終之際尚在口授門生修經之事，遺言云：勿作碣辭，唯題石曰五經先生墓足矣。

小 結

松崎慊堂是江戶後期頗具代表性的考證派儒學者，雖然師承昌平學覺大學頭林述齋，修習作為官學的朱子之學，並長期擔任藩教授，但在江戶後期經學考據蔚成風尚的背景下，學術旨趣發生變化，以致成為漢唐經注校勘之學的核心人物。松崎慊堂漢籍版本學造詣深厚，致仕後致力於漢籍翻刻校勘，而尤以《縮刻唐石經》貢獻卓著。此舉繼承中國儒經刻石傳統，以恢復唐石舊本、正定文字為指歸，在唐石經基礎上，廣採宋元槧本及日本古本，校勘文字，辨析異體，其間既引述清儒考證成果，亦兼下己意，力求成為可資信賴的定本。松崎慊堂《縮刻唐石經》不僅部帙宏巨，校勘精細，而且成書早於民國間張氏誦忍堂《景刊唐開成石經》近百年，雖然校訂經文不乏粗疏淺陋之處，亦未全面參校日本古本，但其草創價值仍不可小覷。楊家駱氏評價張氏誦忍堂本遠賢於松崎慊堂本，並非公允之詞。^①

（本文發表於《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期合刊，2015年3月）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① 楊家駱：《縮印景刊唐石經序》，見載《唐石十三經》，臺北世界書局1955年版。